

← (上接8版)

洲的宪法思想和选举制度,陆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宣扬民本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主义),最著名的是1916年1月发表在《中央公论》上长达一百多页的长文(《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その有終の美を済ますの途を論ず》),正式吹响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号角。

真正使得他把目光移向中国,大概有两个机缘。一个是1914年2月起,吉野到新开设的政法学校授课,由此结识了戴季陶等一大批早期国民党人。1913年9月孙中山策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纷纷逃亡日本,试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914年2月,曾经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寺尾亨博士(1859—1925)在东京发起成立了政法学校,培养训练有志改造中国的中青年,教员中汇集了一批东京帝大的杰出教授,刚刚从欧美游学归来的吉野也被邀请来讲授政治史。以后直至1919年6月学校关闭为止,吉野坚持在这所学校授课,学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他由此接触到了一些不同于他往日天津时代接触过的官场的中国人,也多少使他对中国问题萌发了关切。

1915年4月,他请戴季陶在东京大学政治史讲座中作了一个题为“支那思想的变迁”的演讲,6月5日在筑地的“同气俱乐部”举行的“外交问题研究”的聚会上,他见到了做演讲的孙中山,之后一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餐叙,戴季陶担任了现场的翻译。第二个是受托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展开研究。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从1905年前后开始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头山满(1855—1944)、寺尾亨等请吉野从政治学专业的角度研究一下孙中山等人的中国革命史,在日本播

扬一下他们的革命精神。头山满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扩张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1881年发起成立了“玄洋社”,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亚洲主义者,主张东亚国家联手抗击西方势力的进逼,因而支持代表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孙中山革命党。由于头山满等的委托,吉野才认真地把目光投向了此前的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革命党动向,除了文献的阅读外,他还积极与戴季陶、殷汝耕等人交往,此后又数度会晤黄兴,从他们那里直接了解革命的宗旨、活动及今后的计划。1915年末,从1906年左右开始就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交往,辛亥革命爆发时又专门到中国来表示声援的北一辉(1883—1937)写出了《支那革命党及革命之支那》,寄给了吉野一部,吉野读后对此甚为赞赏,还专门去访问了北一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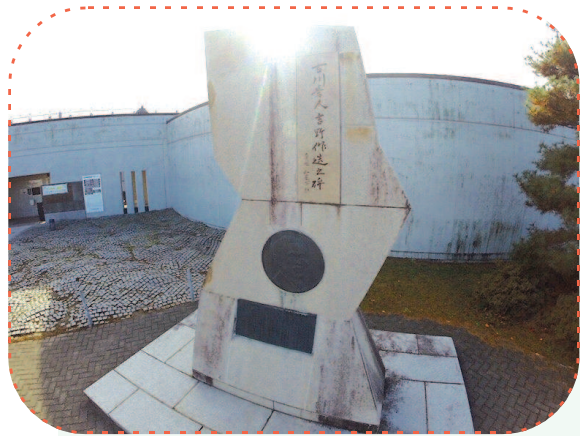
1915年开始,吉野把他精力的相当一部分,移到了中国问题和日中关系上。恰好在此时,日本政府借一战爆发之际驱逐了中国胶州湾的德国势力,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扩张日本权益的“二十一条”。显然这是非常过分的、横暴的无理要求,不仅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吉野所任教的政法学校的中国学生,也举行了罢课以示抗议。吉野对此事也非常关注,在当年的6月迅速出版了《日支交涉论》,详细讨论日本的对华政策。从狭隘的日本人立场出发,认为“二十一条”从日本帝国的立场来看,“大致来说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从帝国将来对中国的发展来看,是极其合适的处置”,肯定了“二十一条”的正当性。这一言论,后来被看作是吉野作造对华观的一个污点,实际上却说明了此时的吉野,尚未脱去几乎所有这一时代的日本人所具有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同时从基督教徒、多少有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宪政主义者的视

角,他也明晰地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理想,在于帮助中国,与中国合作,中国和日本都作为东亚的强国,在所有领域伸张自己的势力,以此为世界文明的文明作出贡献。……不可分割中国的领土,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尊重其独立,充分发挥出他们国家和人民的能力,这必须是我们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选集》第8卷,第134—135页)在这里,吉野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既试图坚持自由平等的基督教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同时仍然无法摆脱国家主义立场。

从1916年开始,一方面是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及与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交往,使他认识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勃兴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和宪政主义思想促使他以平等的姿态看待周边的邻国。1916年3—4月,奉政府之命考察了韩国和满洲的部分地区,撰写了《对满韩的考察》一文。在文章中对日本的所谓满州“经营”提出了建议,警告日本不可过分贪欲,过于露骨地强调日本的利益。对于当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排斥和抵抗心,他表示:“(中国人的行为)虽然有些狂热,但总体来说爱国心的勃发是今天在谈论现代中国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现在中国的民心,一方面是主张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另一方面则是唤起了对外国侵入的强烈反抗。”(《选集》第9卷,第42页)

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1916年,在谈及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时,吉野使用了“跋扈”“侵略”这样的词语。在《日支亲善论》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原本一直以中华大国自居,看不起小国日本,却不料小国日本如今却成了东洋的强国,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有时以高傲的姿态蔑视大国的中国,自然无法使中国对日本产生亲切的感情,“而从日本方面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态度,有时也就变成了它不得不对外侵略的理由,而对中国持以侵略性的态度,自然就会与中国发生冲突。”(《选集》第8卷第206页)因此,若要与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亲善关系,日本对华的扩张政策就必须改弦更张。

受托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党的历史后,吉野意识到了中国的新兴力量和未来的希望在于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身上。当时日本的主流看法,都把此一时期中国南北之间的力量角逐看作是权力的争斗,吉野却认为革命党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改革弊政、建设新中国的勃勃



吉川学人吉野作造之碑



吉野作造纪念馆入口处的民本之钟

富有生气的全民族的诉求”,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新兴力量(《选集》第8卷第257页)。1917年8月,吉野出版了他花了大半年时间撰写的《支那革命小史》,这本书由八章和一个附录组成,内容相当详实,不只是一部革命史,实际上是自甲午战争前后开始一直到第三次革命为止的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史,他在序言中说:“最近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可谓是催生新中国诞生过程中的一段苦涩经历。中国是否有未来,恐怕将取决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如何。……《支那革命小史》实际上是我坦直地叙述中国人为达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一部书,同时也借此机会表示我对中国民族的敬意。”(《选集》第7卷第3页)

也就是说,1916年以后,吉野作造的中国认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革命党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虽然深知前途恐怕还是崎岖坎坷的,但只要这批新生的力量仍在发展,中国应该还有未来。而那时的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资深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等,都觉得靠中国人本身的力量已经很难改变中国,而须借助日本的力量,由日本来帮助中国的改造(内藤湖南《支那论》,1914年),吉野却较早地洞察到了中国新兴力量的崛起,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中国有些微明的将来。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之后蔓延至全国的主要城市。日本的媒体对此作了迅速的报道,《朝日新闻》

在5月5日刊发的新闻标题是《北京发生烧抢事件》,小标题是“排日学生的暴动,章公使受重伤,曹汝霖宅邸被放火”。同一天《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的题目是《北京发生排日暴动》,小标题是“一千余名北京大学生,发出立即归还山东的尖声厉叫,闯入曹汝霖氏的住宅”。受日本媒体的蛊惑,在一般日本人眼中,五四几乎成了暴徒们的狂欢。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态度表示抗议,结果遭到了日本警局的抓捕,吉野作造为此积极奔走援救。

有关五四的消息,吉野作造大抵也是来自这些日文报纸,但是面对舆论的喧嚣,他却发出了冷彻的声音,在6—7月的《中央公论》和《新人》杂志上发表了《不要谩骂北京学生的行为》《论北京大学学生的骚扰事件》《狂乱的惩罚中国论》等文章,对中国青年的“排日”行为,表示了与一般舆论相左的看法:“要根绝中国排日的不良事件,其良策不是去帮助章曹诸君的亲日派、压迫民间的不平之声,而是我们要自我抑制军阀财阀的对华政策,让邻邦的友人了解日本国民内心希望和平的要求。为此吾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力图把我们所爱的日本从军阀财阀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北京的学生运动与我们的目标志向不也完全是一致的吗?”(《选集》第9卷第238页)“北京最近所发生的



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发表多篇文章,图为刊有芥川龙之介和吉野作造作品的《中央公论》(1919年10月)